

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

津门论剑录



张元卿 王振良 主编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上海遠東出版社



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

津门论剑录



张元卿 王振良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张元卿，
王振良主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ISBN 978-7-5476-0272-0

I. ①津… II. ①张…②王… III. ①侠义小说—文
学研究—中国—民国—文集 IV. ①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5140 号

策 划：黄政一
责任编辑：张喜梅
美术编辑：李 廉
封面设计：唐文权
封面题字：来新夏
版式设计：李如琬
责任制作：李 昕

津门论剑录 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

主编：张元卿 王振良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322 千字

印张：14.5

印数：1—2250

ISBN 978-7-5476-0272-0/I·251 定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序

龚鹏程

儒、道、释、文、侠是中国文化的五大传统，彼此交光互摄，互有关联。其中侠文化最具特色，儒、道、释、文皆可传移，而侠不容假借。儒学、佛学、文学，由中国东传日本，基本上可以矩矱不失、匡廓无异；道教之于日本，也有阴阳道、神道、修验道等与之相应，唯独侠不然。

清末梁启超曾著《中国武士道》一书，提倡传统侠义精神，认为中国由于丧失了侠风侠气，才渐衰弱，故应效法日本武士道精神，重新宏扬侠风，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立足。其议虽然正大，但用“武士道”一词来描述中国侠义传统，终显不伦不类。因为中国的侠跟日本的武士毕竟不是一回事。犹如欧洲的骑士、美国的牛仔，都不能用以拟况中国的侠。侠，终究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独特的一部分。

要明白欧洲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乃至欧洲人的心灵，不能忽略其骑士传统；要明白美国人，不能不了解其牛仔文化；要明白日本人，也不能不知其武士精神。同理，想真正理解中国人，不能不对侠文化进行一番探讨，因为那是整个民族最私密的心理经验与精神内涵。

侠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武士道》和其他论述均推源于先秦，这当然

毫无疑义。但我们要注意此一流源颇有盛衰。梁启超早已指出：秦汉以降，侠风渐戢，文弱之风渐盛。前面谈到的儒、道、释、文、侠五大传统中，文的一面似乎渐渐压过了武，也遏抑了侠，以致梁氏要叹侠风而思猛士，呼吁重新振起侠风了。

清朝末年是个侠风重振的时代。一方面，会、党、帮、派结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感，或抗御外侮，或参与革命，展现了前所罕见的活力，侠风以是大炽。另一方面，文与侠产生了奇妙的结合。文士与侠道中人颇有交往，如维新的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章太炎等人主暗杀、倡侠道，作《儒侠篇》，意义同于梁氏之提倡武士道；革命的秋瑾则自己就是鉴湖女侠。

民国以后，这种结合并未结束，且更发展到武侠小说，形成波澜壮阔的现代武侠文学大流。其间虽经历了抗日、内战、“文革”等政治社会之动荡，这一大流却兀自滂沛宏肆，影响遍及世界各华人圈，而且还由文学而衍生了无数武侠文化产业（如影视、动漫、偶戏、服饰、刀剑工艺、武侠文化园区等）。因此若说民国迄今是中国侠文化的盛世，绝不为过。

说至此，读者自将注意到民国期间对武侠文学开拓有功的那一代作家，他们实在功不可没。古代并非没有武侠文学，唐人传奇，明人话本，清代侠义、公案及剑仙小说等当然都不乏佳构，但整体看，无论是对武的技艺参悟、侠的内涵理解，还是对文学性的创造，其质与量，1920年之前和之后都是不能比的。

可是，过去我们的文学史的众多论述，因受新文化运动之影响，对武侠文学甚为鄙夷，诋其为大众通俗文学，谓其以武犯禁，鼓吹暴力，形式又不脱古代说部之遗风，内容则逃离现实，超玄入幻，荒唐无稽，足以败坏风俗、蛊惑青年。却不知从文化史的大脉络来说，武侠文学足以激扬民气，乃清末国势重振以来极重要的文化表现，亦现代社会重构与中

国人文化心灵重构之重要内容。偏于从新文学单一角度的批评，所见者小，且其见识多依傍西方文艺理论，而我们在前面即已说过：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非西方心理经验及意识内涵所能体知，因此武侠小说不应以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诸框架去硬套，或以其为标准去贬抑之。而附入“鸳鸯蝴蝶派”中，或以大众通俗文学而视之，亦均非谛论。

这是说它的价值，兹继述其作家。

一般说现代武侠小说均自1923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作《江湖奇侠传》谈起，但赵焕亭《奇侠精忠传》约略同时亦已出版。赵乃河北玉田人，其作品多刊于天津。嗣后武侠小说名家李寿民、官白羽、郑证因、朱贞木等亦皆活跃于天津。

在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只数京派、海派，并没有天津作家的位置。论通俗文学者，鉴于上述作家多生于或活动于天津之事实，乃特张北派或津派之目，谓上海、苏州为南派。

其实苏、沪之“鸳鸯蝴蝶派”乃晚清消闲游戏的发展，津门的武侠小说则是新东西，跟清代侠义公案等并不是延续性的。且一者儿女情多，一者风云气盛，事非一族，无须并论。津门作家当然也有善于言情的，例如刘云若就是，但其江湖气终不可掩。故知此为津门作家特色之所在，与北京、上海不侔。

这批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1949年以后，曾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灰烬中。但在海外，仍为所有武侠小说作家衣钵之所在，是此后武侠小说最直接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回澜，春雷复动，武侠小说重新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读物，尘封的记忆也才逐渐被唤醒，津门作家也才开始有人去研究、去纪念。

2009年5月在天津召开的“民国北派通俗文学学术讨论会：民国北派通俗文学作家与天津地域文化”，无疑是这项记忆研究的高峰。

主办这次会议的是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与天津市历史

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编有一种名叫《天津记忆》的刊物，该刊物用了5期的篇幅编成了通俗文学专号，再召集海内外专家同行，一起研讨、总结了过去20年来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新的思路。

我本对“北派通俗文学”这一讲法未尽同意，但会议所得，超乎预期，组织方式及会议内容均得到高度评价。我曾在自己的网志上介绍道：“我参加过的学术研讨会不计其数，通病是大会仪式化（领导讲话、官样文章、行礼如仪，学者、专家呆坐听训或当布景摆设）；讨论空洞化（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其实是论资排辈的安排，学者讲完自己那十来分钟，就外出寻亲访友、逛街购物了，彼此之论文也无暇细看，甚或根本没印出来）；会议旅游化（开会真正的重点是旅游、餐饮、度假）。学术机构举办的稍稍好些，其他机构所办则不堪形容。反倒是此等民间团体所办，务实纯朴。会前已编成《民国天津通俗小说创作出版史话》、《白羽研究专号》、《王度庐百年诞辰纪念号》、《还珠楼主研究专号》、《云雁贞霏集》，提供丰富材料以供研讨。旅游安排也就是去考察各小说家之故居旧址，以结合该会之调研报告。会议开、闭幕，亦无领导之讲话，只有主办者向与会学者及小说家后裔敬礼致谢。学者、民间收藏家则专心研讨之。其热烈的情况，竟是在那许多大排场会议中所罕见者。”

会议之后，王振良、张元卿诸兄又精心将相关文稿编成《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内分五个部分：一为民国通俗小说综合研究，二为还珠楼主专题，三为官白羽专题，四为王度庐专题，五为郑证因、朱贞木、刘云若专题，并附当日之会议综述。有组织的会议，再经系统化之编辑，相信能令读者对当年津门武侠小说及其作者有一总体之了解。

我们的讨论，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其中未能展开之处甚多。例如北派与苏、沪之南派尚无比较。上海“鸳鸯蝴蝶派”作家虽说风云气少，但

武侠作品正自不乏。1923年许廑父就开始招收写武侠小说的函授弟子了。同年11月《红玫瑰》载青社诸小说家发起创办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时，平江不肖生即是赞助人。可见上海文坛自有武风，作家亦极盛，包括赵焕亭后期作品也都移往上海发表。故论北派，不能不与南派相比较，否则地域特性终究不显，这是我们论剑时未及处理的。此外又如我们大抵只从文学及出版环境看作家与作品，缺乏社会性的分析。像刘云若写的混混、郑证因写的武术、李寿民写的道术，均有其相应的帮派会党、武术团体、宗教道门之社会组织、发展形态可说，宜关联于民国之社会史言之。吾人为学力所限，亦未遑深究，这都是有待于后来者的。嚶鸣求友，共探记忆之隐，而宏阐吾侠道精神，想也是诸君编辑此编的用意，因不揣浅陋，代为言之。己丑立冬，序于燕京。

目 录

1 / 序 龚鹏程

综合研究

1 / 地域文化与通俗文学之关系 范伯群

5 / “对立”和“同一”

——从“雅”、“俗”翻译界的一件个案说起 徐斯年

13 / 论武侠小说人物及其“创作原型”

——从“北派五大家对港、台六名家之影响”说起

南天老叶

29 / 从“刺马案”到《投名状》

——由历史到文学的转折

林保淳

38 / 论北派通俗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汤哲声

49 / 女人与金庸

郭 娟

还珠楼主研究

55 / 严迪昌、黄汉立论还珠楼主往来书札

70 / 我所知见的《蜀山剑侠传》的版本	简冰如
74 / 《蜀山剑侠传》民国版本初探	顾臻
87 / 还珠楼主著作中的易学思想	黄汉立
119 / 试谈还珠楼主的生命哲学	张元卿
126 / 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	周清霖
162 / 我和还珠楼主的因缘	林哲弘
164 / 欲回天地入扁舟	叶洪生

宫白羽研究

169 / 论宫白羽的“反武侠”反讽	韩云波
186 / 浅谈宫白羽的金甲研究	张元卿
198 / 宫白羽早期作品浅论	侯福志
206 / 回归与超越 ——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郭武群
212 / 宫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发现记	倪斯霆
216 / 宫白羽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倪斯霆
219 / 从宫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谈起	宫以仁
221 / 《中华画报》宫白羽佚文索引	王振良
230 / 关于先父宫白羽	宫以仁

王度庐研究

235 / 浅议王度庐的“民族认知”	徐斯年
245 / 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	关纪新
264 / 《绣带银镖》与《骆驼祥子》谈片	刘祥安
276 / 写在武侠边上 ——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	刘大先

- | | |
|---------------------------------|-----|
| 293 / 《锦绣英雄传》发现记 | 张元卿 |
| 296 / 王度庐的早期杂文 | 徐斯年 |
| 335 / 王度庐的小品文初论
——以《小小日报》为中心 | 孔庆东 |
| 342 / 女性立场的凸现 | 张祎琳 |
| 347 / 王度庐为什么去了青岛 | 王 芹 |
| 350 / 青岛的王度庐故居 | 王 芹 |
| 352 / 王度庐大事记 | 王 芹 |
| 357 / 寻找父亲的足迹 | 王 芹 |

郑证因、刘云若等研究

- | | |
|----------------------------|---------|
| 361 / 郑证因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 韩云波 何开丽 |
| 377 / 《鹰爪王》系列知多少 | 胡立生 |
| 384 / 郑证因小说谱系 | 胡立生 |
| 388 / 天津西沽与郑证因家族 | 穆 森 |
| 393 / 刘云若的短篇小说 | 侯福志 |
| 395 / “江湖气”：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要特征 | 李国平 |
| 408 / 刘云若与保定 | 张元卿 |
| 415 / 刘云若《非非集》索引 | 张元卿 |
| 419 / 朱贞木小说版本流传考 | 顾 臻 |
| 428 / 《中华画报》何海鸣佚文索引 | 王振良 |

附录：

- | | |
|---------------------------------------|-----|
| 433 / 两岸专家“津门论剑”
——民国北派通俗文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 王振良 |
| 444 / 后记 | |

• 综合研究 •

地域文化与通俗文学之关系

范伯群

地域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就面广量大的通俗文学而言,从大处说,由于地域间民风民俗的差异,可分成各具特色的南、北两大派。南派的中心在上海,北派的中心则在天津。研究民国通俗文学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地域给予文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巨大影响,那么我们研究的方法之一,就应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着手,将它切割分块作为研究对象。在各自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纵览它的全局,这样也许更能精准地显示它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研究通俗文学好似跳进一个永远也游不到头的海洋，它的研究对象的界域太广阔了。研究者往往只能重点研究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各个研究者往往有自己的领域与专长。就像奥运会一样，有的是参加百米飞人大战的，有的是参加马拉松的，有的则能在游泳项目中得八块金牌。我是研究通俗文学史的，貌似关照“全局”，其实往往只是“浅尝辄止”。大概有点像参加七项或十项全能的，打着“全能”的招牌，其实是最缺乏观赏性的比赛，跑又跑不快，跳也跳不高。也就是像包天笑曾说过的“猪头肉三不精”，是样样都搞一点的“染指翁”。这次会议是只关注一个单项——论“剑”，是天津地域通俗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个门类。武侠小说本身就是通俗文学中的百米飞人大战，有“看点”，天津的武侠小说界人才济济，更具“亮点”，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我在这方面谈不上什么研究，所知极为浅薄；另一方面，这一次是地域文学研究，就是北派，我也并不熟悉。张元卿读研究生时，我知道他与天津有

(四期星) 日七月一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樓酒原中

廣隨茶中大
式意透西小
臘小點酒筵
味酌心菜席

市設
露天滑鐵鞋場
興建濃厚
有益身心

天風報

第 2397 號

訂報價目
每月一元二角
半年七元
全年十二元
外埠加郵費
零售每份五分

(天风报)报头

较深的关系,就请他将《刘云若论》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毕业时,他想到天津找工作,我也很赞成。我当时就说,对北派通俗文学我们很不了解,你此去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这个南派通俗文学研究群体填补空白。之后我们写通俗文学史时,北派部分也是由他执笔的。我认为单项应该深入地研究,地域也应该发掘它的特色。他到天津的这岁年中,果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北派的部分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不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们的通俗文学史的研究,也应该不断地加以深入开掘与拓展。这次我们是想将近年来的对北派的研究成果作一次展示与交流。通俗文学史其实是我们通俗文学的家谱。由于过去对通俗文学的轻视,甚至是蔑视,我们对通俗文学的家底所知不多,更没有将它提高到学术层面上加以考察与剖析。我们今天是在从事一项很严肃的学术工作,想摸清我们的家底,整理出我们的家谱来,盘点我们的家底与发展的历程,研究我们今后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扬。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要使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平起平坐,通俗文学再也不是文学史的陪客,通俗文学也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人之一。

我认为地域通俗文学北派与南派有不大相同的文坛环境。就南派而言,现在一般认为以《海上花列传》为“开山鼻祖”。但民国以来,南派所受到的压力似乎比北派要大得多。南派从1921年起,就受到新文学家的强烈批判,这也是一种文学的“围攻”。庸俗文学固然应该批判,可是通俗文学却不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要不是市民大众的拥戴,这批中国第一代通俗文学作家是生存不下去的。但是市民不掌握舆论权,不能为他们作辩护。因此,我认为通俗文学一直是处于“默默的强势”与“悄悄的流行”之中,表现了它生存的“韧性”。相对而言,北派没有像南派那样受到新文学家的大规模“围攻”,这样的文坛环境对通俗文学的成长有哪些有利的因素,是可以研究的。

北方作家写武侠小说比南方作家更有地域背景。北派以武侠小说为其特色是与它的地域优势与人文素质有关的。当然，北方培育了张恨水，有自己的刘云若，而南方也有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向恺然。上述南北各有特色的论述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在武侠小说中，展现“武艺”当然是很重要的，也最能吸引读者而使其达到高度的兴奋点。可是优秀的武侠小说却又不满足于“武艺”的表层描述，而是从“道”与“艺”、“德”与“武”的辩证关系入手，深入揭示“武艺”的深层内涵，把“武艺”提升到特有的民族文化的高度去加以颂扬。因此，武侠小说既有高度的娱乐功能，同时又有一定的哲理性。另外，它又是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相结合的特殊形态的小说。还珠楼主能将仙魔派小说写得具有如此无穷的魅力，但是它的内涵却具有分正邪、明善恶的入世情怀。从有些北派小说家的自述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坚守着民族凛然正气而去从事这种职业写作的，宫白羽是这样，刘云若也是如此。上述诸点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常存于我们的心间。那就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南派作家的创作较为定型化，因此有“王气北移”之说。北方的张恨水、李寿民、刘云若等作品的艺术性一路走高。但是，与其说“王气北移”，倒不如说北方作家在北方地域中成名后，南下安营扎寨。原因是多方面的，张恨水是由于严独鹤的约稿，李寿民是由于日寇的迫害。到了南方，特别是上海，这个能将名作家“炒”得更热的地方，使他们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作家。相对而言，刘云若却没有这样的机缘，因此，或许我们可以称他为慢热型的作家。

登载北方通俗文学的媒体与登载南方通俗文学的媒体也可以作一对比。南方除掌握大报的副刊外，刊物特多；而北方一个《天风报》在短短的两年中，就造就了两位超一流的通俗文学作家——还珠楼主李寿民与刘云若。通俗文学与现代化媒介的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总结。

“对立”和“同一”

——从“雅”、“俗”翻译界的一件个案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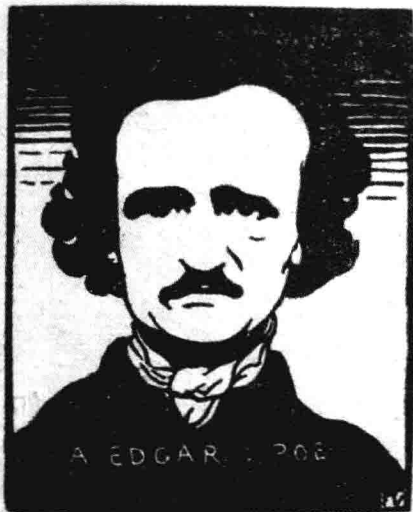
徐斯年

所谓个案，指的是中国近现代对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译介^①。

爱伦·坡是位集“先锋性”和“大众性”于一身的作家。他逝世时尼采只有5岁，佛洛伊特尚未出生，然而他的作品里已然有了“尼采声”和“佛洛伊特式”的心理分析，故被视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远祖”。同时，他又是商业文化的参与者和现代“类型文学”的开创者——特别是侦探小说和海洋冒险小说的“源头”。这样一位作家，对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界是有吸引力的。

中国人发现、介绍爱伦·坡不算很晚：1905年周作人翻译《山羊图》(即 *The Golden-bug*，由小说林发行所出版时改题《玉虫缘》，今译《黄金虫》)，是为介绍的开端。4年之后，即1909年，周氏兄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出版，其中又收入周作人翻译的一篇寓言《默》(即 *Silence: A Fable*，今译《静默》)。译者在书前的“绪言”和书后的“杂识”及“著者事略”^②中评介“坡少负隼才”，“其诗文惨怪哀感”，“奇妙”，“人称鬼才”。鲁迅直至晚年犹叙及青年时代对爱伦·坡的喜爱，而周作人

像 坡 倫 愛



《银线画报》上的爱伦·坡像

翻译《玉虫缘》所据底本，就是鲁迅 1904 年从日本寄回来的^③。

1914 年，《小说月报》第 5 卷第 12 号刊载徐大译作《金虫述异》，是为《玉虫缘》的首次重译。1917 年，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由中华书局出版，内收爱伦·坡之作品两篇：《心声》（即 *The Tell-Tale Heart*，今译《泄密的心》）和《静默》，后者是《默》的首次重译。次年，即 1918 年，中华书局出版常觉、觉迷、天虚我生翻译的《杜宾侦探案》，内收爱伦·坡的 4 篇“前侦探小说”：《母女惨毙》（今译《莫格街凶杀案》），《黑少年》（今译《玛丽·罗热疑案》），《法官情简》（今译《被窃之信》），《骷髅虫》（即《金甲虫》，是为第二次重译）^④。1920 年《小说月报》第 11 卷第 9 号又发表张毅汉翻译的《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原素》，文中以爱伦·坡所强调的“单纯的效力”为构成短篇小说的两个重要原素之一，是为已知首篇介绍爱伦·坡之小说美学的译文。同年《东方杂